以高质量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服务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姜泽廷 卢春龙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党的自我革命在制度建构与制度实施层面的系统性深化。制度是根基，人才是关键。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既要完善以党内法规为主干、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也要着力锻造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专业化工作队伍，提升制度执行质效，二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关键支撑。高校处于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学科知识、把制度要求转化为育人标准的第一线，承载着把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转化为服务全面从严治党治理效能的重要使命。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政法院校提出系统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治理形态从重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从集中治理走向常态长效的深刻跃升，对制度供给质量、队伍专业能力、治理运行效能提出了更为持久、更为系统的要求。

从制度建设看，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在比较系统地解决了“有规可依”的基础问题之后，当前更需回应“执规有效”的质量课题，推动制度建设重心从立规数量积累转向提升体系协同与执行效能，在立改废释中统筹规范属性、效力层级、程序衔接与实施评估，使制度更加科学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力。立足新阶段，必须以扎实的学理支撑回应制度建设和运行中的深层问题。

从队伍建设看，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向纵深推进，管党治党对纪检监察队伍的政治素养、纪法素养、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面对监督场景日益复杂、腐败形态更趋隐蔽的新趋势，短期轮训虽能满足阶段性业务需求，但纪检监察工作对复合型专业能力的深层诉求，必须依托高校完整的学历教育体系和系统化专业培养，才能实现人才队伍的稳定、可持续供给。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政法院校的使命定位更加凸显、功能坐标更加清晰。党政机关是制度执行与治理实践的主体，干部培训院校侧重政策宣讲和短期轮训，科研院所聚焦专项理论与政策研究。政法院校则兼具学科建制完整、学历教育体系化、人才培养规模化、学术积累可持续的鲜明特质，能够一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专业化人才输送、全链条智力服务，具备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基础性、长效性支撑的独特功能。

深化学科协同建设，筑牢制度治党学理根基

学科体系是知识生产的核心载体，全面从严治党进入系统集成、提质增效的纵深阶段，迫切需要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政法院校要推动法学与纪检监察学学科协同建设，凝练管党治党实践经验、形成系统化学科成果，夯实依规治党学术根基。

深耕党内法规研究，推动制度体系高质量发展。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体系形成”迈向“质量提升”，本质是规范供给从数量完备走向科学精准深化。提升制度建设质量，既要把准政治方向，也要从学理上厘清规范层级、优化程序设计、完善评估机制，破解制度协同、执行成本、基层适配等问题，确保制度立得住、行得通。政法院校应系统开展基础理论、备案审查、纪法衔接等方向研究，为党内法规立改废释提供学理支撑；推动党内法规研究从学科方向培育走向独立学科建制，有效联动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持续推动党内法规体系朝着更加科学严密、务实管用的方向完善。

完善纪检监察学科体系，服务提升监督执纪执法水平。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关键在于把监督执纪执法纳入制度轨道，以稳定的规则、程序和方法保障权力规范运行。纪检监察工作政治性、实践性极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成从零散实务经验向系统化学科知识的跃升，形成可传承、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技术体系。

推进纪法贯通融合，释放学科协同效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关键在于打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执纪与执法之间的衔接通道，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建设层面，体现在党内法规学与纪检监察学的深度融通。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党纪与国法既有规范层级差异，又有价值内核贯通，必然要求把纪律尺子与法律尺子一体运用，实现规范识别、程序衔接、证据标准、责任认定的有机融合。政法院校应立足学科协同优势，把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作为学科交叉的主攻方向，围绕纪法界限划分、程序衔接、证据转化、责任聚合等核心命题开展系统研究，将党内法规的更高标准与国家法律的底线规范融贯于理论建构之中，持续为完善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供学理支撑，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实际治理效能。

健全人才培养体系，锻造过硬专业队伍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来落实。纪检监察领域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决定着制度运行质效与管党治党水平。破解专业人才紧缺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依托高校学历教育体系，构建可持续人才供给机制，为管党治党事业注入源头活水。

健全一体化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管党治党领域的人才能力需求具有鲜明的层级性，从基层实务操作到中观统筹协调，再到理论研究与政策创新，不同岗位对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的要求各有侧重。与之相适应，人才培养必须构建分层分类、梯次衔接的完整体系，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深化“理实结合”的实战化育人模式。纪检监察与党内法规工作实践性突出，专业能力离不开实践淬炼。实战化育人的核心，是建立学界与实务界的协同育人机制，将实务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着力破解学用脱节难题。政法院校应推动共建联合培养机制，实现方案、导师、课程、实训协同联动，形成校校合作示范；联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国央企纪检机构共建高水平研究和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与实务实训，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岗位一体锤炼政治能力、纪法素养与实操本领；探索“实务导师进课堂”等教学机制改革，推动一线经验融入教学，构建课堂与实践双向联动的育人格局。

布局前沿交叉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数字时代腐败形态隐蔽化、数字化、跨境化特征凸显，监督执纪执法场景持续迭代，对人才复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政法院校要前瞻布局交叉培养方向，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纪检监察实务，培育兼具纪法素养与数据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支撑智慧监督体系建设；同步拓展境外廉洁合规、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培养方向，依托涉外法治学科优势，服务国家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企业境外廉洁合规需求，为管党治党长远发展储备战略人才力量。

强化智库支撑与实践协同，提升管党治党效能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成效最终要落到治理实践中。政法院校应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打通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通道，持续推动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高端智库服务制度建构与资政建议。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离不开专业化学理支撑与决策咨询服务。政法院校依托法学、党内法规、纪检监察交叉学科积淀，兼具规范研究深度与实践研究广度，能够在制度立改废释、纪法衔接机制、治理效能评估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智力支持，是服务科学决策、提升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咨政力量。

以协同实践赋能国家治理与廉洁文化涵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是重要保障。政法院校立足学科特色，以学理支撑强化监督效能，以廉洁文化涵养凝聚社会共识，是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政法院校要积极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地方纪委监委共建高水平研究基地，围绕数字监督赋能、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区域廉洁营商环境建设等全局性课题联合攻关，推动成果转化为治理实践方案，助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向纵深覆盖；打造廉洁文化传播矩阵，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纵深传播；常态化开展纪检监察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夯实监督队伍履职根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分别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君子主忠信

□ 王占一



“主忠信”出自《论语·学而》。孔子论君子修养，强调以忠信为本。朱熹释其义为“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重在尽心，信重在诚实，二者贯通于人的言行。一个“主”字，表明忠信应成为立身的根本，须臾不可背离。对他人的托付是否认真，对自己的承诺是否郑重，在人情与道义之间如何取舍，都能见出修养的深浅。

尽己以忠，处事有责

“为人谋而不忠乎”，曾子将尽心为人列为每日省察的要事。为人谋事，应当体察其处境，认真权衡利弊。事情交到手中，就要担起相应责任。对自己有利时尽心，对自己无益时敷衍，便失了忠厚之意。尽己，是把他人的事情放在心上，也把自己应尽的本分落到实处。

忠厚贵在任事有终。令尹子文离任时，仍将政事告知继任者，孔子称许其“忠矣”。职务可以变动，已经承担的责任应有交代。日常共事也是如此，遇到难处主动商量，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经手的事务妥善办结。愿意多想一层、多做一步，才能使他人的托付有所依靠。

尽心还须讲求实效。为人谋划，既要有诚意，也要肯下功夫。情况不明便深入了解，能力不足便勤学求教，意见不同便耐心沟通。倘若满足于口头表态，事情仍会悬而未决。诚意须经事务检验。既问自己是否尽力，也问他人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才能使尽心成为有益于人的作为。教师认真回应学生的疑问，领导干部耐心解决群众的困难，都是在具体职责中践行忠厚。责任尽到何处，尽心便体现到何处。

践言以信，待人有诚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首先要求言语真实。知道多少，就如实说多少，尚无把握，便坦诚说明。言语影响他人的判断，失实的表达可能使人付出无谓的代价。为了取悦他人而夸大，为了保全自己而隐瞒，都会伤害信任。肯于尊重事实，才能使交流有可靠的基础。传播信息先核实来源，表达观点分清事实与推断，也是言而有实的应有之义。越是交流便捷，越要对说出的话负责。

信也见于承诺兑现。季布以一诺见重，曾子以杀彘教子，都将信用落实于行动。许诺之前，应当量力而行，不为一时痛快随口应允。答应之后，就须记在心上，尽力办理。赴约是否守时，借物是否归还，受托是否回应，看似琐细，却是他人认识一个人的直接依据。信用便积累在这些往来之中。认真对待自己的言语，也就是尊重他人据此作出的安排。轻慢承诺，受损的还有对方的时间与心力。

守信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事情比预想更难，仍愿努力完成，才能见出承诺的分量。确有困难，也应及时说明，主动商议办法，对自己的疏失认真弥补。任由对方等待，或以含糊言辞搪塞，只会加深隔阂。人与人能够放心合作，有赖于彼此言语可信、行事可靠。珍重信用，也是珍重他人交付的信任。

以义为准，交往有则

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约定合乎道义，所说的话才能得到恰当履行。忠信要求言行有实，也要求明辨是非。许诺之前，应想清事情是否正当，是否损害他人，是否违背共同遵循的规则。对不当之请轻率应允，日后往往陷入两难。慎重于开端，正是对承诺负责。义使承诺有了正当的根据。对不应答应的事有所拒绝，才能对应该承担的事负责到底。

朋友相交，应以善道相勉。“忠告而善道之”，包含真诚规劝的责任。看见对方言行失当，能坦言提醒，帮助其认清利害，才算尽到朋友之责。涉及公私取舍，更应立场分明。私人交情再深，也不能侵害公共利益。对不合道义的请托，坦诚说明，明确劝止，既能守住自己的操守，也使对方免于行差踏错。

以义为准，还须防止一味迁就自身利益。不能有利时强调守约，不利时便借口变通。凡属正当的承诺，就应认真履行，有了过失就应主动承担。道义使人知道何事当为，信用使应为之事得以落实。二者相互支撑，才能使交往既有真诚，也有准则，在亲疏远近之间保持公正。

笃行有恒，积久成德

“主忠信”，贵在持守有常。偶尔尽心容易，长久尽责需要耐心，一时守诺容易，面对得失仍不改易更见操守。事情无人过问时，能否认真办理，约定过去许久后，是否仍记在心上，都是切实的考验。忠信成为习惯，须在一次次选择中用功，逐渐养成稳定的品格。若总要先计算能否获利、是否有人称赞，忠信便容易随利害而动。将其视为应尽的本分，才有持久的力量。

持守始于不欺己。杨震暮夜却金，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回应“暮夜无知者”，见出内心自有准则。旁人是否看见，不能成为决定行为的尺度。独处时检点言行，无人督促时认真履责，才能使人前人后的真诚相一致。把内心的准则守牢，忠信才不会随着外在处境改变。

省察能够使持守日益笃实。曾子反复自问忠与信，启示人们将修养落实到具体事情。为人谋事有没有疏忽，说出的话是否夸大，答应的事情是否遗漏，都值得认真反思。发现偏差便及时纠正，有所亏欠便尽力弥补。日有所省，行有所进，才能在不断改过中增厚德行，使忠信成为终身受用的涵养。

君子主忠信，以尽己之心任事，以真实之言待人，以道义审察取舍，以笃行成就操守。从每一份托付、每一次承诺做起，忠信便有了日常的形貌，也使君子之德有了坚实的依托。

我看君子文化

夯实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根基 铸数据为信史

□ 张宜春

202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深刻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这一重要论断提出了智能时代的重大文化命题：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认知，中华文化主体性如何巩固？

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载道之具，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与模型对话获取知识、形成判断、理解世界。大模型的输出结果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接受“事实”的第一来源。数据、算力、算法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要素。算力可以购买，算法可以迭代，唯有数据，在很大程度上界定模型的知识谱系，并与对齐训练共同塑造其价值倾向。数据的竞争，深层是文化解释权的竞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发展，不仅仅体现于大模型输出的内容，更体现于大模型所构造的文脉根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脉的根系已经下探到训练数据的深处。数据能否载道，直接关系文化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巩固与发展。

文化数据和其他领域的数据存在根本不同，注定了不能未经处理便直接“投喂”给大模型。在工业、医疗、通用图像等领域，标注对象的边界相对清晰，分歧可在技术标准内裁决。文化数据则不然。其一，文化数据多为多模态数据：古画是图像，古琴是声音，非遗是影像，古建是三维点云。数据背后的文化语义并不自明。未经标注，模型难以习得像素背后的年代题材、声波背后的曲牌声腔、点云背后的形制源流。其二，文化内容芜杂纷繁、良莠不齐，一词多义随时代流转，同一经典版本歧出，同一人物评价两极，精华与糟粕并存，本无明确的定义和边界。标注正确，模型学到的是文化事实；错标与不标，学到的只是谬误和芜杂。因此，在各类文化数据中采撷精华，以标注加以明确的定义和解释，铸成来源合法、出处可溯、内容可信、标注规范的高质量文化语料——本文称为“信史数据”，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传世之功、立世之基。

那么，这件关系文脉根基的事情，需要以治史为鉴。治史在中国文化认知中，向有千钧之重；史之所存，是一个文明对自身的记忆与态度。自唐设史馆之后，修史渐成国家之制，史书一经写定，便是后世认知的根据。历代治史，采信考辨于史料，定本确解于事实，慎之又慎于传世，形成一整套为后世存信的认知制度。铸数据为信史，其道有三。

一曰采信，先定入库之物。面对芜杂的数据海洋，必须回答：什么内容有资格传世——只有重要的、确定的、有文脉延续价值的内容，无论其出自传世典籍、馆藏文物、非遗记录，还是互联网原生数据。采信之道，库藏不妨博观，入选必求精审。正如蒙学选篇之于童蒙、《春秋》书法之于后世，不求多求全，但求立其正、定其准、传其神。昔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先作《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明言去取之由、存录异说：凡入选之语料，亦必经多源印证、辨伪存真，方可入库。

二曰定本，以标注成正解。对入库语料，以标注做到“四定”：定名，规范其名称与归属；定性，规范其时代、真伪、品类与源流；定义，规范其本义、语境与文化内涵，说透说准；定值，标明其价值语境与评价坐标。四定既成，定本即立；一时难以定论的异说，留存附注。《谷梁传》言《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标签所立即“传信”，附注所存即“传疑”，既立统一标准，亦存争议出口。标注是铸成信史的灵魂工序：数据经此，方从素材成为正解。

三曰传世，以致其用。信史数据应以公益形式开放供给，通过高质量数据集目录、模型备案与安全评测等机制，引导行业优先采用，使其成为大模型文化认知的基础语料；同时以信史数据为基础形成评测基准，及时发现并修正模型文化认知偏差，形成“训练注入其里、评测把守其表、对齐贯通其中”的闭环，引导模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此，中华文化主体性方能随模型服务进入亿万人认知系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四定”标注正是标识体系的机器可读形态；《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数据供给创新、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部署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并专设“标注攻坚”行动，文化领域亟须拿出自己的高质量数据集，信史数据正当其任。从更深一层，铸数据为信史，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落实抓手和具体举措：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唯有以信史数据的形态进入训练流程，方能在智能时代的认知生产中出场；把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数据，正是三大体系建设从“纸上”进入“数中”的关键一跃。聚国之贤良，铸数据为信史，是人工智能时代正本清源的基础工程，事关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事关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根基。

中华文明向有盛世修史的传统。人工智能所使用的高质量文化数据，某种意义上就是新时代的“史”。铸数据为信史，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治史。昔人以笔墨，为万世存信史；我辈以数据，为千秋立正源。这份志业，落在了新时代研究者的肩上。

（作者系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数字艺术部主任）

文化视点